

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周海生

摘要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樽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关键词 曾子《曾志》 吕兆祥《宗圣志》《武城家乘》 王定安《宗圣志》 圣贤事迹

中图分类号 B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1)03-0117-11

作者:周海生,男,1973年生,山东曹县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学史、儒家文献、传统家族文化。山东 曲阜 273165

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是中华文化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构建者、承载者。西汉以降,历代王朝对以孔、颜、曾、孟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人物,不仅敕赠荣封,敦崇祀典,修缮林庙,而且嘉惠圣裔,钦赐祭田,优免差徭,可谓褒崇有加,代增隆重。与此相应,记载儒家圣贤事迹及历代封赐、林庙修建、祭祀典礼、碑传诗赋、优礼后裔的文献也应运而生。这些专记儒家圣贤事迹及其家族概况的志书,我们统称之为儒家圣贤志或儒家圣贤家族志。

揆诸历代正史,并无“圣贤志”或“家族志”“宗族志”之目,其内容散见于相关传、志、表中,故“虽无特立之‘志’,而有若干资料保存”^①。南宋绍兴年间,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撰成《东家杂记》,分类记载有关孔子的杂事旧迹,可谓圣贤志书的发凡起例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史部传记类之首“圣贤之属”。由宋元以迄明清,圣贤志之撰著,代不乏述,而特别着意于圣贤家族史迹的志书也大量涌现,专记某一家族的志书尤为丰富。学界对于记载孔、颜、

^① 冯尔康:《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孟三氏家族史的《阙里志》《陋巷志》《三迁志》，多有探讨和论述^①，对记载曾氏家族史的《宗圣志》则关注不多。比如，马淑晨的硕士论文《明代儒家圣贤家族志研究》，重点探讨有明一代圣贤家族志的编纂、体例、内容等相关问题，而仝晰纲、郑立娟的论文《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则未涉及曾氏家族志，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即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曾氏家族志的纂修过程、体例异同等问题作一初步梳理，希望有助于深化曾子及其家族文化的研究。

一、曾氏家族志纂修之缘起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人。曾子为孔门大贤，上承孔子，下启思孟，有功于圣道之传，极受后人推崇，被奉为孔学“正宗”，尊为“宗圣”。明嘉靖十八年（1539），朝廷授予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钦赐祭田户役，优免差徭，曾氏后裔得以与孔、颜、孟三氏后裔同享国家优礼。

较之孔、颜、孟三氏而言，曾氏不仅受封世袭翰博时间为晚，曾氏家族志之编纂亦极后。被学者称为“最早的孔氏志书”^②的《东家杂记》，成于南宋，足见孔氏志书之编纂历史久远。颜、孟二氏志之撰著，则始自明成化十八年（1482）刊刻行世的《孔颜孟三氏志》六卷，为时任邹县儒学教谕刘濬纂修。此后，弘治十八年（1505）山东提学副使陈镐所撰《阙里志》十三卷，正德二年（1507）颜子六十一代孙、世袭翰博颜公铨所撰《陋巷志》八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山东按察司佥事、沂州兵备道史鶚所撰《三迁志》六卷相继刊刻^③。以上孔、颜、孟三氏专志自嘉靖至崇祯间历经多次修纂，日益完备。而曾氏第一部专志《曾志》，则迟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才刊刻行世。曾氏志之编纂何以如此之晚？个中缘由，与宗圣故里曾子祀典无人主祀不无关系。

曾参之后，多代定居于鲁，或耕读，或出仕。王莽篡汉，曾子第十五代孙曾据“耻事新莽”，于始建国二年（10）挈族渡江南迁，徙居豫章庐陵郡吉阳乡^④。南渡之后，曾氏后裔以庐陵为中心，向闽粤、江浙、湘蜀等地迁徙繁衍。宋代以降，曾氏家族兴盛，南丰曾氏、晋江曾氏、章贡曾氏皆名重一时，大显于世。

与曾氏家族在南方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曾据挈族南迁以至明初，宗圣故里难觅

① 参见徐兰筠、崔俊艳、张延龄：《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杜泽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载《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30页。马淑晨：《明代儒家圣贤家族志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仝晰纲、郑立娟：《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孙聚友、杨晓伟：《孔子家族全书·典籍备览》，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③ 《孔颜孟三氏志》《阙里志》等圣贤志书，《四库全书》概未收录，仅列存目，收录于《四库存目》史部传记类。此种分类方法并不能完整反映圣贤家族志书的性质和内容，故《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阙里志》《陋巷志》《三迁志》列入“史部·地理类·专志”，较为近实。而《孔志》《仲志》《曾志》《宗圣志》《孟志》等以姓氏或人物命名的家族志，则仍列入“史部·传记类·别传”。实质上，二者在内容和体例上并无太大差别，皆属记载圣贤事迹及家族史的专志。

④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世系·浼公房系》云：曾据“耻事新莽，始建国庚午年十一月挈族渡江，家庐陵之吉阳乡”。见曾毓樽等纂修：《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二年（1807）木活字本。

曾氏后裔的踪影,以致曾子祠墓不守。曾子自有封谥以来,载在祀典,春秋配享孔庙。然而,嘉祥之邾国宗圣公庙宇却久已倾圮荒废。宗圣庙创建于何时,史无确载^①。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特敕天下有司修治应祀神庙。曾子为孔庙四配之一,在天下通祀之列。经嘉祥县教谕温良上疏奏请,于正统十年(1445)八月重建宗圣庙,次年二月落成。明宪宗初,下诏修治曾子墓。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山东巡按金洪“疏请恢阔,如颜、孟制”,又对宗圣庙扩建增修,“阅七年而事竣,宏敞壮丽,仅亚孔庙”^②。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曾氏后人散在四方,曾子故里难觅曾氏后裔之踪迹,以致自正统十一年(1446)宗圣庙重建落成至嘉靖十八年(1539)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除朝廷遣官致祭外,宗圣祭祀皆由地方官主持。而颜、孟二氏则早在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③,已置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祀事。宗圣祀典长期无曾氏嫡裔主鬯,颇与礼制有碍,亦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弘治四年(1491),山东嘉祥县儒学训导娄奎上疏言:“本县系邾国宗圣公曾子阙里,庙堂配享有子思、阳肤、公明宣等数人。……颜、孟子孙皆传博士主祭,曾子子孙乃流落他所,乞如例封其门人,访子孙遗派之在江西赣榆二处者,择贤而有学者官之,俾之主祭,以昭圣代祀典。”^④诏下有司,其后竟无下文。嘉靖十二年(1533),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顾鼎臣上疏,再次奏请详访曾子后裔,他说:“曾子传道之功优于颜子,而孟子私淑于曾子、子思,今颜、孟子孙皆世袭博士,而曾子之后独不得沾一命之荣,岂非古之缺典也哉?”^⑤请求朝廷派员访求曾氏子孙相应者一人,授以翰林五经博士,世世承袭,俾守曾子祠墓,以主祀事。礼部遵旨议定,命山东巡抚、巡按官亲临嘉祥县查访,又因曾氏子孙播越流寓,散之四方,遂通行天下南北直隶、十三布政司、抚按衙门一体访求。嘉靖十四年(1535),江西抚按督同提学副使徐阶查得江西永丰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诏徙山东兖州府嘉祥县,以衣巾奉祀宗圣祠墓。十八年(1539),授曾质粹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承主祀事。

嘉靖三十九年(1560),曾质粹病故。因曾质粹之子曾昊未袭早卒,而曾昊之子曾继祖又自幼双目失明,兼遭祖、父连丧,迁延稽迟,未得请袭翰博。时至万历元年(1573),遂生曾氏翰博冒袭事件^⑥。万历二年七月,经吏科给事中李盛春、吏科都给事中刘不息、山东道御史刘光国等参勘,吏部查议,认为曾氏之嗣当属曾继祖之子曾承业。而此时曾承业年仅十三岁,愚駮孱弱,吏部会同山东布政司,将曾承业送三氏学行令习学,“候一十六岁,起送承袭”^⑦。万历五年

① 许彬《重建宗圣公庙记》载:“(宗圣庙)在今兖之西嘉祥、金乡县界,庙南北去县各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阳,邑人以义起之,不知所始。”见李天植:《曾志》卷四《瀚藻编》,明万历二十三年曾承业刻二十六年增修本。

② 李天植:《曾志》卷四《瀚藻编》,明万历二十三年曾承业刻二十六年增修本。

③ 按:《曾志》载顾鼎臣《乞采访曾子后裔疏》云:“弘治间,因修颜子、孟子庙,特置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各一人。”误。据《明史·职官志》,颜、孟二氏置世袭翰博,时在景泰三年(1452)。见《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1页。

④ 林尧俞:《礼部志稿》卷九十四《正曾子庙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4页。

⑤ 顾鼎臣:《乞采访曾子后裔疏》,见李天植:《曾志》卷四《瀚藻编》,明万历二十三年曾承业刻二十六年增修本。

⑥ 关于曾氏翰博冒袭始末,参见拙著:《嘉祥曾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8-213页。

⑦ 《万历五年袭职札付》,见李天植:《曾志》卷四《瀚藻编》。

(1577)八月,曾承业正式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

曾承业袭封之后,鉴于冒袭翰博事件对曾氏家族的冲击,故致力于光大祖德、整饬族务。在奏请重修宗圣庙、补拨曾氏祭田之外,为增强曾氏族人对宗圣曾子的情感认同和维护,树立曾氏翰博在天下曾氏的中心地位,还兴建大学书院,编辑《曾子全书》,蒐集整理曾氏家族文献。正是由于曾承业的锐意修创,曾氏第一部家族志应运而生。

二、《曾志》:曾氏家族志的首次编纂

自曾质粹从江西永丰东归嘉祥,单门弱祚,勉力支撑,中经曾袞夺袭之争,至曾承业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方才安定下来。曾承业“感于前之变迁,非志无以彰往;又惧后之湮晦,非志无以训来”^①,遂有仿效《陋巷》《三迁》二志,创修曾志之念。

曾承业向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姚思仁面陈纂辑曾氏志之缘由:

粤自圣师,为万世教父。吾先子亲则及门,甫逾冠而聆一贯,迨垂老而著稠书。其在孔堂,虔始要终,以肩道统,即颜氏无多让焉,思孟可知已。而乃以我一二宗人,越在他国,庙器之不守,而典籍之多残,余实恧焉。属者承业再世以上,始应诏命,归奉冢祀。一介羸孤,胡与于诸未复之跼?而今厥家渐定,乃捃拾为此书,而巡道李君润色而授槩铅。^②

显而易见,曾承业作为世袭翰博,对于曾氏典籍之残缺,深怀自愧之心,更有革新之勇。他在此处提到的“巡道李君”,即时任钦差分巡兖州等处地方兼曹濮兵备屯田马政、山东提刑按察司签事李天植。李天植,明南直隶广德州(今安徽广德县)人,字性甫,号冲涵。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平阳推官,奏绩治平天下第一,擢吏科给事中。因直言忤当朝,迁湖广副使。后转任四川参政、曹濮兵备等职。著述甚富,有《礼记哀言》传世。李天植在任曹濮兵备之时,以曾氏无志、典籍不备为憾事,便与城武知县张居仁搜集史志文献,撰成《曾志》初稿。他在《曾志后序》中详述撰著始末:

余治兵曹濮,有暇日进鲁诸生而问典籍。诸生曰:“有《阙里志》在。”余批阅而叹曰:“周礼其在鲁乎!”问颜、孟,皆有志,而曾志独缺。间取颜博士家录数卷读之,亦鲁鱼帝虎耳。呜乎!东鲁之于文学,其天性也,况当右文之朝,前哲辈出,乃令典籍不备,斌斌之谓何?于是与城武张令谘耆耆、刺群籍,取旧志而裒集之,汰什一,益什五,为一家言,以归博士。猥云补史氏之缺,为曾氏忠臣而名山之哉,抑亦俾曾氏之典籍不至湮没已也!^③

由此序中“以归博士”之言可知,曾承业呈送姚思仁之书,其主体即李天植纂修之《曾志》。然此志之初成,当在何时?《明分省人物考》记载,李天植“甲午,被命飭兵曹濮”^④。甲

① 万民命:《宗圣志序》,见吕兆祥:《宗圣志·旧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9册)影印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明崇禎刻清康熙增修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63页。

② 姚思仁:《曾志序》,见李天植:《曾志》。

③ 李天植:《曾志后序》,见李天植:《曾志》。

④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一《李天植》,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36(132),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744页。

午,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据王定安《宗圣志》所载《明万历初修宗圣志序二首》,注云:“志成于万历二十三年六月。”^①由此可知,《曾志》之编纂,当在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而其书之初成,时为二十三年六月。

此书经曾承业呈送山东巡按姚思仁。姚思仁,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万历癸未(1583)进士,授行人,迁江西道御史。天启二年(1622)升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年九十一卒。著有《律例解》《五经疏注》等书。姚思仁是个非常重视文化的官员,得见此曾氏志,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他不无感慨地说:“夫是书初订,诂曰不刊,而一意为述,则孔氏窃比之义存焉。以进于史,则列在章而非在野;以降于乘,则副在司存而非家。千载获麟之野,恍若重瞻乎瑞物。而是编甫竣于事,则谓为《曾氏春秋》,其可乎?”^②他认为,孔、颜、孟三氏皆有志,以纪世系暨累朝恩礼之盛,“曾氏身负道宗,侂颜启孟,顾独缺此杀青一编书,以致武城之地望几埒于凡封,而皇帝神明之胄无别于下姓”,如今曾氏有此志,足以彰显曾子传道之功及后裔袭封之荣。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姚思仁发牌至城武县,敦请城武县令再将曾氏志修改订正,以传久远: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姚为纂修先贤庙志,以阐道化事。准曾子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送纂修《三省志》到院,为照先贤庙志垂示久远,必须考订详明,文词尔雅,始称大典。该县素称三长,宜堪秉笔。为此牌仰本县即将发去曾庙志书二册,移文嘉祥县吊取原稿及诸书册,从新笔削,务使堪垂不朽,庶称本院委重之意。^③

被姚思仁赞誉为“素称三长,宜堪秉笔”的城武县令,也就是李天植在《曾志后序》中提到的“城武张令”张居仁。据道光《城武县志》记载,张居仁字叔广,直隶赵州人。由进士知县事,政修人和,多所创建。工诗文并画,升胶州知州^④。张居仁曾参与纂修《兖州府志》,于修志素所擅长。待《曾志》修订完竣,姚思仁遂责成李天植助成其美,他说:“《曾志》成,何不付杀青?岂以曾有功于圣门,在颜、孟下耶!……是编也,载曾氏之孝大备,博士家家传而户诵之,则经翼而传,不必衍矣。且圣天子以孝道兴理,锐意治平,用是以备献纳、待顾问,其为益非鲜小也,岂直曰备曾氏典籍云乎哉?”^⑤在这里,姚思仁对曾子传道之功备极尊崇,肯定了《曾志》“备献纳、待顾问”的经世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曾氏志书之名称,曾承业称之为《三省志》,而姚思仁直称《曾志》,意在凸显曾子,故定名为《曾志》。在姚思仁的大力支持、督促下,李天植“遂檄城武,以付劂鬲氏”^⑥,《曾志》得以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刊刻行世。

《曾志》四卷,首一卷末一卷。该书卷首有姚思仁《曾志序》、凡例十条、《曾志目录》,卷末有李天植《曾志后序》。其主要内容为:

首卷为图像,包括宗圣章服像、莱芜小像、孔曾授受图等人物图十二幅,皆有赞一则,为宋、明人所作;后有邑里总图、武城遗址图、旧庙图、新庙图、林墓图、祭器图、陈设图、宗系图。

卷一为“派源编”,卷端镌“曹濮兵宪桐汭李天植纂修,城武知县张居仁校录,裔孙博士曾

① 曾国荃重修,王定安撰:《宗圣志》,《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907页。

② 姚思仁:《曾志序》,见李天植:《曾志》。

③ 李天植:《曾志·附》,见李天植:《曾志》。

④ 袁章华修,刘士瀛纂:《城武县志》卷六《职官志》,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⑤ 姚思仁:《曾志序》,见李天植:《曾志》。

⑥ 李天植:《曾志后序》,见李天植:《曾志》。

承业绣梓”，分邑里、古迹、世家、列传、宗系、显裔6子目，辨曾子故里南武城为明嘉祥县所统之地，载其古迹，略述曾氏之源及其世系。

卷二为“型范编”，分遗事、格言、尚论3子目，汇辑曾子嘉言懿行及历代对曾子的赞誉。

卷三为“崇重编”，分祠宇、茔墓、封秩、章服、释奠、祀典、恩荫、给田、户役9子目，胪列历代礼典。

卷四为“翰藻编”，分诰勅、祭文、赞文、题咏、碑记、奏疏、文移7子目，备载遗文往什。

末卷为“杂纪”，载曾肇《曾子传》、欧阳修《代曾子答弟子书》、曹琛《邳国宗圣公上梁文》及元武宗《初献邳国公乐章》。

《曾志》之纂修，虽为时稍嫌短促，内容亦未臻详备，但其发凡起例，于曾氏志之编纂实有开创之功，故当时多获赞誉。济宁知州万民命称“先贤道脉，至是而复明”^①，翰林院修撰朱之番亦赞扬《曾志》使“道统增明，儒林生色”^②。万历二十六年，《曾志》又略有增修，卷首增补了焦竑、万民命、朱之蕃诸序，卷端题名“城武知县张居仁校录”改为“城武知县张居仁同纂”，卷末附曾继祖万历戊戌《曾氏祖庙永思碑铭》^③。此增修之本，国内仅浙图有藏，足称珍异。

三、吕兆祥重修《宗圣志》

崇祯元年（1628），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承业因年老告休^④。八月，年方十八岁的曾弘毅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鉴于《曾志》草创，中多遗漏，尤其是“历代崇祀本末记载未备”^⑤，吕兆祥乃应曾氏之请，网罗载籍，荟萃故实，详述“曾氏南北传源，详其端委”^⑥，于崇祯二年（1629）撰成《宗圣志》。

吕兆祥，明浙江海盐人，曾辅助其父吕元善创修《圣门志》^⑦。自万历癸丑（1613）至崇祯己巳（1629）十七年间，吕氏父子纂成东鲁志书20余部，其中就包括吕兆祥撰修的《宗圣志》^⑧。

① 万民命：《宗圣志序》（万历乙未仲夏），见吕兆祥：《宗圣志·旧序》，第272页。

② 朱之番：《宗圣志序》（万历丙申孟秋），见吕兆祥：《宗圣志·旧序》，第274页。

③ 按：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07册《曾志》云：“据明万历二十六年曾承业刻本影印。”而其书纪事则至万历二十三年，姚思仁、李天植前后两序亦作于万历乙未（二十三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经与浙江图书馆所藏《曾志》比对，浙图藏本有曾继祖《曾氏祖庙永思碑铭》，作于万历戊戌（二十六年），应为后之增刻。而《甲库善本丛书》影印者，实为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故本文所引《曾志》，版本题为“明万历二十三年曾承业刻二十六年增修本”。

④ 曾毓樽等纂修：《武城曾氏重修族谱·吴公房系》，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二年（1807）木活字本。

⑤ 永瑛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九《史部·传记类存目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33页。

⑥ 樊维成：《宗圣志序》，见吕兆祥：《宗圣志》，第457页。

⑦ 《嘉兴府志》卷五十七《海盐文苑传》载：“吕元善，字季可，以监生历山东藩司理问，尝修《山东通志》。更创《圣门》一志，自四氏、七十二子、汉唐宋诸儒宗系、祠祀、林墓，无不考据明确。后以襄赈劳劾卒。”见许瑶光修，吴仰贤等纂：《嘉兴府志》，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⑧ 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宗圣志》十二卷”，云“国朝孔胤植辑”。见沈初等撰，杜泽逊、何燊点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39页。《清史稿·艺文志》亦沿其误，云“孔允植撰”。见《清史稿》卷一四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83页。孔胤植，为孔子六十五代孙，天启元年袭封衍圣公。《清史稿》避清帝讳作孔允植，实为《宗圣志》作序者，非撰者。

吕兆祥所撰《宗圣志》共十二卷,卷一为《像图志》,卷二为《世家志》,卷三、卷四为《追崇志》,卷五、卷六为《恩典志》,卷七、卷八为《事迹志》,卷九至卷十二为《艺文志》。原任山东学政项梦原通览全书,大加赞叹,称誉《宗圣志》:“仰承宗圣两千年之道容,若在吾眼;远绍六十三代之懿脉,足畅家风。”^①吕化舜在为《宗圣志》所作序中,曾简述各卷撰作之旨趣:“一之为图像,若见乎三省之丰容也;二之为世家,见枝胤绵邈,南北一宗也;三、四之为追崇,代褒王言、林墓祀祠之足重也;五、六之为恩典,受官翰院、赐续祭亩之为异数也;七、八之为事迹,经集所传格言、尚论之可风世也;九、十、一、二之为艺文,奏章、记序、碑志、诗词之能章隐传远也。”并称吕氏之作,“竭蹶其精思,周咨其幽隐,以成卷帙,有以昭显宗圣之云昆于天地间耳”^②。

吕兆祥纂修《宗圣志》,得到了曾承业、曾弘毅父子的鼎力支持。在吕兆祥应允重修曾氏志之后,曾承业即请序于山东学政项梦原等人。项氏《宗圣志序》云:“有曾翰博者,俨然进余曰:‘家志草创,中多遗漏。方赖公同乡吕君圣符慨许担当,颇为颜、孟诸志未竟,尚有待也,而冠篇之序,敢为预取于公。’……第三数年间,于曾氏父子,则既承撰于前翰院,复践约于今宗英。”^③前翰院,指的是曾承业;今宗英,即代指曾弘毅。《宗圣志》未撰之先,多为曾承业奔走其事;书成之时,曾弘毅已袭封,主要担负梓刻之责。

《宗圣志》习见之版本,为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清康熙增修本。前有崇祯二年孔胤植序、丁宾序,崇祯二年项梦原序,崇祯元年樊维城序,崇祯二年吕化舜序,又万历旧序。记事至康熙二十三年。南京图书馆、河南镇平县图书馆亦有此刻本。关于《宗圣志》的初刻时间,《四库全书总目》云:“书成于崇祯中。而《世家志》述其谱系,乃载及国朝康熙中事,《恩典志》内亦载及顺治初年,不知何人所增,盖非尽兆祥之旧矣。”^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亦认为,《宗圣志》“初刻于明崇祯末”^⑤。杜泽逊先生则认为,“是本为明崇祯二年刻清康熙间增刻本”^⑥。据笔者所见辽宁图书馆所藏崇祯间刻本,卷一题:“海盐吕兆祥重修,曲阜孔胤植、句容孔贞运参考,兄吕维祺、男吕逢时编次。”钤朱文“东北图书馆藏书印”“九峰旧庐珍藏书画之章”二印记,为杭州王体仁“九峰旧庐”旧藏。卷二《世家志》述曾氏谱系,至六十三代曾弘毅,记事至崇祯二年正月,其时曾弘毅19岁,尚未命字,故“字”下空二格;卷五《恩典志》记事至崇祯元年八月,曾弘毅袭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卷九《艺文志》记载奏疏至《曾子六十二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承业请祭田疏》。于此可见,《宗圣志》初刻当于明崇祯二年,后于康熙年间增修。

另据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卷一《像图志》较崇祯二年刻本和康熙增刻本又增东配述圣子思子像并赞、西配亚圣孟子像并赞、东庀阳肤像并赞、西庀乐正子春像并赞、东庀公明仪像并赞、西庀沈犹行像并赞、东庀公明高像并赞、西庀单居离像并赞、东庀公明宣像并赞、

①③ 项梦原:《宗圣志序》,见吕兆祥:《宗圣志》,第452,450-452页。

② 吕化舜:《宗圣志序》,见吕兆祥:《宗圣志》,第457-458页。

④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九《史部·传记类存目》,第533页。

⑤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第8册《孔孟史志·宗圣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⑥ 杜泽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西庠公孟子高像并赞、东庠孟仪像并赞、西庠子襄像并赞、东庠曾元像并赞、西庠曾华像并赞、东庠曾申像并赞、西庠曾西像并赞共十六图；卷二《世家志》述曾氏谱系，较康熙增刻本又增六十六代曾尚溶，记事至雍正三年八月；卷十二《艺文志四》所载诗文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古诗之前后顺序与康熙增刻本古诗居前、律诗在后不同。由此本可知，吕兆祥所撰《宗圣志》于雍正年间亦有续补。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曾以“项梦原《序》一篇，词涉乖谬”^①为由，将《宗圣志》列入抽毁书目。查项梦原《宗圣志序》，有“乍抛衡士笔，去捉灭胡刀”^②之语，恐即四库馆臣所谓“词涉乖谬”之因。故而，吕兆祥所撰《宗圣志》传流不广。尤其是崇祯二年刻本，国内仅辽图有藏，殊可宝贵。

四、《武城家乘》：一部被忽略的曾氏志书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曾子六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毓樽在吕氏《宗圣志》的基础上，撰《武城家乘》。此为曾氏家族志的第三次修纂。

曾毓樽，字注瀛，乾隆二十六年（1761）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鬯近五十年。袭封之初，曾毓樽就致力于曾子林庙的维护，“凡庙林、书院、家庙，黏补最勤，纪事碑版亦多，俾后有可查考”^③。他还撰修《武城家乘》，联合曾氏南宗联修《武城曾氏族谱》，在曾氏家族文献的保存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王定安称誉说，论曾氏宗子功德，“承业翰博之后，此为再见”^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毓樽之所以编撰《武城家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亲诣阙里释奠之时，两次陪祀，“荣沾圣泽，铭刻于中，即欲敬陈于言”。但是，自明崇祯二年吕兆祥《宗圣志》修成到清乾隆中叶，150多年里《宗圣志》没有续修，曾氏优崇之典、家族事迹缺乏翔实的记载，“取旧志一为披读，巨典无征，更不胜惶惶如也。缘以翦陋无闻、铅槧未习为歉”。二是一些熟悉曾氏典故的人年岁渐长，存世无多，如何更完整地保存曾氏事迹，成为曾毓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他在《武城家乘序》中所言：“十余年来，老成凋谢，述颂者半归乌有。恐闻者异辞，传者又异辞，世远年湮，异日不惟貽数典忘祖之羞，而于国家煌煌承祀之仪，徒令载纪天渠，而考古者适予以询，转置焉而弗详，罪奚辞焉？”为了使曾氏事迹传流于后世，曾毓樽以吕氏《宗圣志》为基础，“考实多据旧志体裁，悉自为编，去繁芜，阙疑会，易其名曰《武城家乘》”^⑤，于乾隆四十六年刊刻行世。

曾毓樽纂修之《武城家乘》共十卷，卷一为纶綍附像图，首载谕旨、圣制赞序、遣告祭文；次为像图，计宗圣像、配享像、从祀像、事迹像、先贤曾氏像、从祀像并赞以及祭器图、陈设图、庙林图、书院图、家庙图、曾氏赐第图、邑里图、武城遗址图等；卷二为世系，分姓源、宗子、恩裔、显达、节孝5子目；卷三为祀典，分释奠、封号、祭器、礼仪、庙林建置、书院建置、赐第建置、世职附

① 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5页。

② 项梦原：《宗圣志序》，见吕兆祥：《宗圣志》，第451页。

③④ 曾国荃重修，王定安撰：《宗圣志》卷四《世系》，第212，213页。

⑤ 曾毓樽：《武城家乘序》，乾隆四十六年（1781）木活字印本。

祀生、祀田户役 9 子目；卷四为褒崇，分诏、诰敕 2 子目；卷五为事迹，分著述、遗事、格言、尚论、先贤曾氏暨二代先儒遗事、古迹 6 子目；卷六至卷十为艺文，分奏疏、碑、铭、历代赞论、祭文、上梁文、书、传、颂、记、诗、匾对 12 子目。

曾毓樽在《武城家乘序》中说：“盖不敢公诸海内，亦为自道家门之鄙意云尔。”依此推测，此书刻成之后，流布不广，故多不为人所知。但从曾毓樽序和此书内容而言，《武城家乘》属曾氏志书无疑。虽名为“家乘”，实与家谱有别。《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日本东京大学所藏曾毓樽纂修《武城家乘》十卷，将其列入“史部·谱牒类”^①，似为“家乘”一词所影响，而未顾及其书之内容、性质。《中国家谱总目》著录“[湖南浏阳]《武城家乘》十卷”，题曰“曾毓樽纂修”，但又曰：“曾参六十七世孙衍焯，字允信，清康熙间携诸弟自闽长乐迁居浏阳县东乡。是为居浏阳支子孙所修。”^②其误更为显然。此本除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胶卷）之外，国内唯温州市图书馆有藏，上海图书馆有缩微胶卷，亦同一印本。

五、王定安《宗圣志》：曾氏家族志的集成之作

曾毓樽纂修《武城家乘》一百余年后，至清光绪中叶，王定安承曾国荃之命重修《宗圣志》，这是曾氏家族志的第四次纂辑。

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两江总督曾国荃收到南宗曾氏寄来的吕氏《宗圣志》，希望曾国荃出资支持，重新梓刻，以永其传。曾国荃，湖南湘乡人，字沅甫，号叔纯，曾国藩之弟，为曾氏徙居湘乡之支裔。曾国荃便嘱托王定安校订。王定安，字鼎丞，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因受到曾国藩赏识，荐举江苏昆山知县，任满入曾国藩幕，担任幕僚长达 20 年之久。王定安工古文，长于史志，其历时三载撰成于光绪十五年的《湘军记》，体裁完整，叙次贍备，内容翔实，为时人称道。王定安对吕氏《宗圣志》颇多批评，认为其所载曾子言行“颇多疏漏，且不详所本，盖沿明人臆断陋习，芜杂不复成章”^③。于是，他征得曾国荃的同意，由曾国荃檄调桐城州同洪恩波共赴嘉祥宗圣故里，与曾子七十四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曾宪祐一起，商讨曾氏家乘、碑记，又经山东巡抚张曜差遣济宁州牧蹇念猷、嘉祥县令陈宪襄助，耗时近半年，将入清以来曾氏事实搜集略备。

鉴于吕兆祥《宗圣志》体例复沓，王定安重修之时，悉变其例，由丹徒（今江苏镇江）陈庆年将曾氏事实依类汇编，“采之于吕氏者什不及二三”。至于世系、邑里，伪托臆撰舛戾之处，王定安则详加辨订，“贗者纠之，漏者补之”^④，于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完稿。

^①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 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715 页。

^② 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第 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557 页。按：自明曾质粹奉命北还嘉祥故里，授翰林院五经博士，曾氏遂有东宗、南宗之分，居嘉祥者为东宗，徙居湖南宁乡者为南宗。明清时期，东、南两宗多次联合纂修《武城曾氏族谱》，嘉庆三年（1798）曾毓樽与南宗曾衍咏共同主持重修《曾氏族谱》。按曾氏族谱修纂南宗设局、东宗查核的惯例，《家谱总目》所载谱籍为湖南浏阳之《武城家乘》，极有可能是作为此次修谱的参考资料，而后流散、存留于浏阳者。温州图书馆所藏《武城家乘》乾隆四十六年刻本，为清儒孙诒让后人孙延钊所捐玉海楼旧藏。

^③ 王定安：《曾子家语叙》，《续修四库全书》第 932 册，第 298 页。

^④ 王定安：《宗圣志序》，见曾国荃重修，王定安撰：《宗圣志》，第 10 页。

王定安所撰《宗圣志》共二十卷,卷一、二为图像,卷三为传记,卷四为世系,卷五为邑里,卷六为述作,卷七、八为祀典,卷九为祠庙,卷十为林墓,卷十一为祭告,卷十二为荫袭,卷十三为祭田,卷十四为户役,卷十五为院第,卷十六为弟子,卷十七为私淑,卷十八为赞颂,卷十九、二十为旁裔。卷一卷端题:“湘乡曾国荃重修、东湖王定安编辑。”卷首有王定安自序,卷末附《明万历初修宗圣志序二首》《明崇祯续修宗圣志序二首》^①。相比前修诸志,在体例上,王定安作了较大改进:一是将传记、世系、邑里、祀典、祠庙、林墓、祭告、荫袭、祭田、户役、院第、赞颂等单列;二是增加了述作、弟子、私淑、旁裔等类目;三是合并了一些类目,如将古迹并于邑里,将显达、恩裔等附于世系,将碑、记、奏疏、公牒依其性质附于祠庙、林墓、荫袭、祭田、户役诸类目之下。就撰述体例而言,较前志更为谨严,类目更为清晰,多有创新。

王氏《宗圣志》不仅体例较前完备,在内容上也呈现出史料翔实、详略得当、征信以传的特色。史料方面,如卷六《述作》,将汉代以来史志所载《曾子书》及《孝经》《大学》之著述尽数罗列,并加按语以阐己见;卷十六《弟子》,详考曾子弟子事迹,甄而录之,凡十二人,自汉郑玄《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元吴莱《孟子弟子列传》以后,自此而有曾子弟子列传;卷十七《私淑》,将孟子而后私淑曾子之后贤,择其精粹者著于篇,凡此皆前志所未有。详略方面,每卷卷端均述撰作之由,如卷三《传记第二》题:“尼山执艺,七十二贤,阐扬至孝,肇自史迁,哀集诸子,缀为长编,搜逸表微,一贯斯传,纂《传记》。”卷七《祀典第六上》题:“武城褒赠,始唐高宗,迄于有明,称子黜公,於穆圣清,四配礼崇,综而甄之,歆享靡穷,纂《祀典》。”卷十二《荫袭第十》题:“圣贤遗泽,光若日星,颜孟苗裔,世荷簪纓,赏延之典,独后武城,守其宗祧,永作王宾,纂《荫袭》。”卷十八《赞颂第十六》题:“诗有颂体,史载赞辞,秩秩宗圣,百世所师,纂《赞颂》。”与《曾志》、吕氏《宗圣志》卷端所题“志曰”“叙曰”云云相比,更为简明,要而不繁。征信方面,无论世系、传记、述作、祀典,还是弟子、私淑、旁裔,皆载明出处,而前修诸志多只辑录原文。再如,宗圣之里籍,明代以来即多有争议,聚讼纷纭,王定安于《邑里篇》备列《山东通志》《兖州府志》《沂州府志》《嘉祥县志》《济宁州志》诸志之记载及明人王雅量、清人顾炎武、阎若璩、周柄中、俞正燮、赵佑诸家之说,以使后来者知所折衷,可谓深具良史信而有征之风范。

王定安撰《宗圣志》,质量更高,搜辑史料最为全面,故其书一出,颇为时人所重,流传也最为广泛。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藏有清光绪十六年金陵刻本。又有清光绪二十八年金陵刻三十一年校补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自明万历二十三年《曾志》成书,中经崇祯二年吕兆祥续修,清乾隆四十六年曾毓樽增益,到光绪十六年王定安重纂《宗圣志》,曾氏共有李天植《曾志》、吕兆祥《宗圣志》、曾毓樽

^① 按:王定安将李天植《曾志》亦称为《宗圣志》,似为时之习称。曾氏志书,分而论之,则为《曾志》、吕兆祥《宗圣志》、《武城家乘》、王定安《宗圣志》四种,合而论之则可统称《宗圣志》。曾子七十四代孙、宗圣奉祀官曾宪祜《重刊宗圣志序》云:“《宗圣志》一书,为我十二世祖、宗圣六十二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承业公所创修,直指姚思仁先生主编,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成书。复有我十一世祖、宗圣六十三代孙、翰博宏毅公重修之,海盐吕兆祥先生主编,于明崇祯二年六月修竣。清乾隆间,我五世祖、宗圣七十代孙、翰博毓樽公,复修《武城家乘》。光绪十六年,我湖南湘乡南宗、宗圣七十代孙、一等威毅伯忠襄公,属东湖王定安先生,据上列志乘及翰博府档案等,又续修之。”即将四种曾氏家志,一概称为“宗圣志”。见曾宪祜、曾约农、曾祥适重刊《宗圣志》,宗圣奉祀官府发行,1974年版。

《武城家乘》、王定安《宗圣志》等四部家族志。就其内容来看,最为突出的在于体例的变化,类目设置渐趋细化、完备,但其编纂主旨,即树立嘉祥世袭翰博在天下曾氏中的权威、中心地位,则始终贯彻如一。故四部志书对于发生在明万历、崇祯年间的两次争袭翰博事件,从奏疏、公牒到任职札付皆备载无遗,嘉祥世袭翰博宗子合法地位由此昭布天下。另一方面,明万历至清光绪 300 年间,曾氏如此锲而不舍,一再纂修《宗圣志》,亦充分显示出在尊孔崇儒的文化氛围下,曾氏后裔通过宣扬曾子肩系儒家道统的特殊地位,从而提升自身地位、巩固孔颜曾孟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强烈诉求^①。曾氏家族志的编纂,凝聚着曾承业、曾弘毅、曾毓樽三代翰博和曾国荃等曾氏后人的情怀和辛劳,对于保存曾氏家族文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深入了解曾氏家族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资料。

(责任编辑:西 寒)

^① 全晰纲、郑立娟认为,在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编纂者的文化观念中,孔子、颜回和孟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实际上,融入、巩固这一文化共同体,于曾氏而言,尤显急迫。如吕兆祥《宗圣志》未撰之前,曾承业即请序于山东学政项梦原,云“冠篇之序,敢为预取于公”。书成之后,又请序于衍圣公孔胤植,而以其序为首,即是明证。参见吕兆祥《宗圣志》卷首孔胤植序、项梦原序;全晰纲、郑立娟:《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1期。

realistic basis is tha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were a large-scale annexation wars between the kingdoms, and the rulers of all countries wanted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rapidly.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come from mental-nature theory and heaven human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which served as the core is Mencius' ideology. Mencius' debate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has a very important purpose, that is to achieve benevolent govern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ebate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Mencius' kingcraft politics focuses on the value requirement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gnores the desig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and fails to make effective restrictions on the rulers. General political practice requires that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hould be balanced to a certain extent, rather than leaning in either direction. In a word, although debate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can deduce benevolent government theoretically and advocate value rationality, it always encounters many difficulties in practical political practice.

Key words: Debate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Kingcraft Politics

Sanctification of Confu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Gao Ruijie

Abstract: In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Confucianism, the saint king establishes his legitimacy on condition that he has both virtue and official 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Confucius is the top of saint kings' tree, and the Confucians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uncrowned king for Confucius in order to sanctify Confucius and to solve theoretical problem that Confucius had no official position. After Dong Zhongshu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theory was combined with "Chenwei"(讖纬) and became more popular.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deduced the fact that Confucius established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m. On one hand, they provided legal basis for the Han Dynasty's political ru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used king's education to positively assist realpolitik. He Xiu not only approved of the fact that Confucius established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stressed that this method could be used in all dynasties. Therefore, Confucius' system making has both realistic and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s, so that its universality was highlighted. Thus, Confucius, the system maker, gradually became the greatest sage who is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people for all ages.

Key Words: New Text Confucianism; Confucius; Sanctification; Uncrowned King; Establish Political System

Okada Takehiko's Eluc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ng Yangming's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Ouyang Zhenren ; Zhang Xu

Abstract: Wang Yangmi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his Xin-Xue philosophy, which had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from Okada Takehiko, a famous Yang-ming scholar in Jap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Wang Yangming's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relies on relevant literature, firstly, it expounds Okada Takehiko's understanding,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ner evolution of Wang Yangming's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n explores Okada Takehiko's thought development based on Wang Yangming's view. Okada believes that the change of learning mind contributed to the ideological change of Wang Yingmang's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However, whether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Great Learning* is questionable. There is an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Wang Yangming's thought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Okada Takehiko's theory of body, the idea of " symbiosis " in his later years. The theory of "Zhi Zhi"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Okada's theory of "Zhi Shen". And "the benevolence of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cept of symbiosi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Okada Takehiko; View of *The Great Learning* ; Theory of Body; Symbiosis

Compil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Family Chronicles of Zeng Genealogy

Zhou Hai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Zeng Zhicui, the 59th generation grandson of Zeng Zi, who inherited the Five Classics Doctorat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beyed the imperial edict to go back to his hometown Jiexiang. Since then, collecting and editing the literature on Zeng famil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ancestral virtues to harmonize the family, which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descendants of Zengzi. Hence, the compilation of Zeng genealogy has been prov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eans to identify and motivate the descendants to promote virtues of Zengzi. From the 23rd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to the 16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ZongSheng Records* by Zeng family at Jiexiang had been compiled and revised four times. The first edition is called *Zengzi Records* compiled by Li Tianzhi in the 23rd year of Emperor Wanli. Then, Lv Zhaoxiang recompiled *Zongsheng Records* in the 2nd year of Emperor Chongzhen. After that, Zeng Yuzun compiled *Wucheng Genealogy* in the 46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fourth edition is *Zongsheng Records* compiled by Wang Dingan in the 16th year of Emperor Guangxu.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the changes of written styles an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ifferent editions, through which the detailed Zeng genealogy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of Zeng family could be clearly observed.

Key Words: Zengzi ; *Zengzi Records*; Lv Zhaoxiang *Zongsheng Records*; *Wucheng Genealogy*; Wang Ding'an *Zongsheng Records*; Sage deed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iling Style of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Zheng Lijuan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family Chronicles of Confucius in the past dynasties shows clear traces of transmutation. I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originated, and the style was mostly genre of parallel catalogs. The compiling style of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in the Ming Dynasty gradually became mature and complete by changing from the genre of parallel catalogs to the genre with outlines and sub-purposes or the combination of two styl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was innov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Ming Dynasty, it innovated the genre of "Chronicles", adopted the category structure of "one chronicles one volume" and embedded the applica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genre.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alogy of Yan, Zeng, Meng and other sages, so the study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is conducive to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family history of Confucius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Confucius' Family Chronicles; *Queli Records*; Style; Genre of Parallel Catalog; Genre with Outlines and Sub-purposes

Difference of Order Mode between Confucians and Legalists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Thought of "Su"

Qu Zhenpeng

Abstract: In sorting out the theory of liberal order, Friedrich August Hayek proposed "Self-generating Order" and "Artificial Order", which demonstrate the autonomy and coerciveness of order respectively. The view is also contained in the thoughts of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Taking "Su" as an example,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have very different attitudes, reflecting different pursuits of order mod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Confucianism advocates "Mei Su"; while Legalism advocates "Yi Su" with a negative attitude. First of all, it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Confucianists and Legalists. Confucianism advocate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which means to obey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Su"; while Legalism hold the opposite attitude, namely, changing and reforming the tradition. Secondly,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 "Su" between Confucianists and Legalists reflect different patterns of order. Confucianism emphasizes the role played by "Su"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spontaneity of "People" and "Su", which is a bottom-up model; while Legalism changes the "Su" to achieve coerc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 and order, which is a top-down model.

Key words: Confucian and Legalist; "Su"(Custom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rder

"An Unevolved Ontology" : Heart, Conscience or Transcendent Existence ?

Ye Da

Abstract: The puzzle of what is "Weifa"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s been discussed by many scholars. Zhu zi, Wang Chuanshan and Mou Zongsan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philosophers whose views respectively represent Neo-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y of Qi and the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Zhu Zi used the separation method; his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the mind and nature. He argues that b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eart through experience, the heart binds together the principles, and then it manifests itself appropriately. Wang Chuanshan advoca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eation. he believes that the "unevolved ontology" includes the standing of the mind, the rising of the will, the creating of human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feelings, which is a dynamic process. Mou Zongsan advoca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ner transcendence. The core of his interpretation is the transcendental mind. He believes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mind realizes self-transcendence under the effort of awareness, so that emotions can be rationally presented. All three of their theories are reasonable and logical.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Bamboo Slips Five-ele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unevolved ontology" refers to the role of cognitive mind in moral practice, its core is the thinking of the mind,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rational cognition.

Key words: Unevolved Ontology;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alis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e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ner Transcendence; *Bamboo Slips Five-element*